

中外文學

國際比較文學學會
論文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專刊

- | | |
|----------|-------------------------|
| Ibsch | 批判西方理論的可靠盟友與不可靠盟友(楊明蒼譯) |
| Schmidt | 系統理論—跨越界限之憑藉(易鵬譯) |
| Van Peer | 文學理論的世界成分(古佳艷譯) |
| Schaffer | 東方學的浪漫觀(張錦忠譯) |
| 廖炳惠 | 閱讀他者之閱讀(翁振盛譯) |
| Magliola | 「挪用」和／或「模仿」的方法(蔣淑貞譯) |
| 王建元 | 中國文評詮釋模式中的比喻特性 |
| Fokkema | 文化知識、文化本體、文化相對主義(馬耀民譯) |
| 周英雄 | 中國文學主體易位三例(張錦忠譯) |
| Ohtaki | 比較文學之基本探討(易鵬譯) |
| Seixo | 有關理論轉移的一些問願(姜台芬譯) |
| 楊松年 | 研究中國文學批評作品所面對的問願 |
| Trapp | 「論述聚凝理論」(蕭瑞莆譯) |
| 陳傳興 | 銘幽一試論韓愈死亡書 |

第 二 第 · 卷 十 二 第
期 〇 三 二 第 總

中 外 文 學 月 刊

發行人
編輯顧問

顏元叔 王靖獻 朱立民 余光中 高友工 夏志清 葉維廉 齊邦媛 李歐梵

王夢鷗 朱炎 姚一葦 胡耀恒 袁鶴翔 葉慶炳 劉紹銘 羅錦堂

社長 宋美

總編輯 張惠

執行編輯 易

業務經理 彭碧

業務助理 彭碧

卿 台 鵬 娟 璵

出版者

中外文學月刊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轉
電話：(業務部) 三三〇三三—
三六八

印刷者

(編輯部) 三三〇三三—
三六八
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永和市成功路一段四三巷五號

港澳零售
總經理

田園書屋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56號2樓

▲訂戶敬請保留封套編號以便聯絡或查詢▼
親友代訂折合新台幣，註明收件人姓名地址

國內零售每册新台幣八〇元

訂閱 { 全年新台幣 八五〇元
兩年新台幣 一六〇〇元

郵政劃撥(〇二九六五—) 中華文學月刊社

國外平郵 { 港澳地區美金 46元
其他地區美金 53元

航空 { 港澳地區美金 59元
亞大洋洲美金 65元
歐美非洲美金 71元

請寄滙票或個人支票，受款者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

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
號伍零貳壹第字誌台版局

類一第記登准核政郵華中
號〇四二第字台紙聞新

• 版出日一月七年十八國民華中 •

中外文學 目錄

第二十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號

國際比較文學學會論文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專刊

批判西方理論的可靠盟友與不可靠盟友 4

Elrud Ibsch 著
楊明蒼 譯

7 系統理論——跨越界限之憑藉 19

Siegfried J. Schmidt 著
易鵬 譯

文學理論的世界成分 35

Willie Van Peer 著
古佳艷 譯

東方學的浪漫觀 43

Elinor S. Schaffer 著
張錦忠 譯

——論魏廉·貝福之衍化中國故事與擬中國故事

閱讀他者之閱讀 63

廖炳惠 著
翁振盛 譯

「挪用」和／或「模仿」：某些難題的關鍵 77

——希臘文、拉丁文、英文、法文、梵文

Robert Magliola 著
蔣淑貞 譯

中國文評詮釋模式中的比喻特性 109

王建元

文化知識、文化本體、文化相對主義 125

Douwe Fokema 著
馬耀民 譯

中國文學主體易位三例 137

周英雄 著
張錦忠 譯

比較文學之基本探討 153

Toshio Ohtaki
易 鵬 譯

有關理論轉移的一些問題 181

Maria Alzira Seixo
姜 台 芬 著

研究中國文學批評作品所會面對的問題 187

以毛詩・關雎序爲例的說明

楊松年

「論述聚擬理論」 207

Richard Trapp
蕭 瑞 甫 譯

文化間接受理論芻議，以六朝小說寫例

銘幽——試論韓愈死亡書 217

陳傳興

記新加坡「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會議 245

張靜二

批判西方理論的可靠盟友與不可靠盟友

(Elrud Ibsch)

蟻布思著
楊明蒼譯

我想引一段西方學者的觀察，作為我討論可靠與不可靠盟友的開場：「無論如何，當我面對莎士比亞和密爾頓的作品時，我閱讀並了解它們，但是它們並非我所有：它們是屬於英國人的。」（布萊希一九八八：頁XI）這是美國讀者反應批評的知名代表人物布萊希（David Bleich）的聲明。我想，很多亞洲的文學研究者一定是心有戚戚焉。布萊希的話反映了典型美國少數民族文化特點，他繼續說道：「在閱讀我父親要我看的米勒（Arthur Miller）劇作《推銷員之死》的時候，我才決定走上文學批評或研究這條路。第一次讀這劇本時，我並不知道米勒是和我一樣的紐約猶太人，但是不知怎的，他的語言，他的課題，他對家庭與職業的態度，在在遠較莎士比亞更能讓我感同深受。」（大學時）我都是仰賴具新教徒色彩的新批評學者教授的定規和概念來詮釋艾略特。雖然我學士論文寫的就是艾略特，但他卻從未令我感動。」（同上）

從上述布萊希所舉具體例子的摘要中，我們卻看到本文要討論的更大問題——所謂世界文學的典範，以及將這套典範強加在根於不同文化，具有不同情感和認知反應以及不同信仰的人時，可能產生的強烈懷疑。

典範的形成是具有強烈規範衝動的文化參與行為，不應強加於文學讀者之上。讀者群能建立自己的典範，亦即選擇一套文學作品作為文化參考座標。認為讀者有此無庸置疑的自由，依我看來，應視為可靠的盟

友。史密斯 (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1989) 是西方學者中，再三鼓吹在典範形成方面解放次級文化團體的一位。佛克馬 (Douwe Fokkema 1986) 也持相同立場，雖然他的氣質和修辭較史密斯遜色。我們可以作此結論，今天沒有埋首於文化研究的人，會因亞洲讀者與歐洲讀者的典範差異而感到驚訝。一旦我們拋棄傳統上視典範價值為作品內含特質的假定，就當把重點放在文學團體中制定價值的過程。(參見史密斯一九八九：九九；佛克馬一九八六；佛達斯旦 Verdaasdonk 1989)。

我有意以西方學者對傳統西方有關世界文學以及普遍性等觀念的批評作為開場；視價值非作品內在必要成分的學者會支持這種批評態度。但是在各位認定我們完全同意彼此的看法，而我也可就此擱筆之前，我必須再提醒我對典範形成作為一種文化參與的描述。我想我的論文中會引起問題與爭議的方面，不在文化事物參與者的角色上，而在文化系統觀察者，也就是科學研究者的角色上。

我們很能了解非歐洲的學者，比如亞洲學者，在典範形成以及文學的學術研究上，都希望建立自己的身份立場。他們不願屈就於殖民式言說 (colonial discourse)，而想從自己的觀點來討論自己的社會與文學狀況。如此一來，他們便傾向於加入那些從內部批判西方理論與方法的 (西方) 學者的陣營。

現在亞洲學者在批評派別各家之言中有諸多選擇的機會，因為目前批評論述有急速增加的趨勢，其數量較實際研究成果為多。事實上，這並非好事；相反地，卻是嚴重的負擔。

解構批評便是舉世聽曉的一家之言。我們對這學派至少都有些大體的概念，適切地說，它是批判性詮釋學 (critical hermeneutics) 的一支。解構批評者和其他詮釋學批評者抱持一樣的信念。對他們而言評價和描述是不可分的，同時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有結構上的類同關係 (structural homology)，而讀者與研究者也難以區分。但是解構批評者更進一步：他們不接受由約定俗成、經社會化傳遞、在歷史評價過程中為人肯定，而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意義。值基於時間、空間與語言協同一致的身份概念乃遭摒棄，取而代之的則是語言的自主性。由於超越意旨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 的缺憾，使得意符 (signifiers) 的範域及遊戲永無

止境。("L'absence de signifié transcendantal étend à l'infini le champ et le jeu de la signification," Derrida 1967: 411 註①)。

建構任何身份的觀念柱架——現存與缺隱 (presence and absence) 乃遭否定 ("Le jeu est toujours jeu d'absence et de présence, mais si l'on veut le penser radicalement, il faut le penser avant l'alternative de la présence et de l'absence," Derrida 1967: 426 註②)。德希達將任何尋求身份的企圖界定為對起源的懷舊式渴望，一種在形而上思維已遭摒棄的時代中，不正當而過時的天真想法。定位中心的置缺不再是失落 (perte)，而是如尼采所說的，一場「沒有安全感」(sans sécurité) 的遊戲，一種可能，一種尋找痕跡的探索 ("l'aventure séminale de la trace," 427)。

許多採行這種語言觀以及由其而生的「破壞性言說」(discours destructeurs) 之批評實踐的學者，聲稱他們較那些運用所謂「經驗論」(empiricist) 方法的學者更接近歷史與社會。他們這種破壞性的特色在於能夠適當地揭露那些在獨裁、傳統的西方理論下注定沈默的聲音，諸如女性的聲音、有色人種的聲音以及其他受壓迫團體的聲音。然而事實卻恰得其反。實際上我們聽到的是帶有濃厚法國口音的學術腔調，其風格帶個人主義色彩而具說服力，是受過修辭學及語言掌控訓練的批評。很顯然的，言說、個人主義及正文重於解釋、共通主觀性 (intersubjectivity) 及作品的文意格局 (context)，但是唯有後者才能導向歷史。解構批評大師提供破壞性言說給屏息受教的知識社群，但我懷疑任何受壓迫者是否曾被問過，他或她能否在其中辨認出自己的聲音。究竟解構批評能背離歷史多遠，玻·德曼 (Paul de Man) 的生平與著作提供了註腳。德曼其人其作是文學研究中既嚴酷又值得探討的事件，而解構批評讓德曼能忘卻及掩飾過去。

不信奉西方批評中德希達這派的亞洲學者可能對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言說理論 (discourse theory) 有較深的印象。我們必須這麼說，傅柯對西方思想的歷史轉化及不同知識系統的選擇，提供了較有系統的方法。傅柯的中心思想是言說 (discourse)。雖然他接受非言說式的範域，諸如政治、經濟、科技、

社會、教學，但是因為言說的統合潛力，乃構成實踐系統的整體性（傅軻一九六九）。比如說：「普遍性的觀念」是一種講法，它將非言說式的制度成分統合到「較高教育」（higher education）的言說整體中。

在傅軻的哲學架構中，言說產生其對象。言說並不指涉，它是一種實踐，有系統地創造實體。作為研究方法而言，他的「考古探源學」（archaeology）既不是科學（它並不去探求或建立因果關係），也不是人文學科的訓練（它沒有主體來給作品或現象賦予意義。考古探源學家必須描述一個歷史年代的言說實踐情形。有時候，傅軻在指出某個特定時刻必然會出現某種特定言說時，卻陷入決定論的追求中。他理論中交待不清的一環是考古探源學家的立場。考古探源學家是否能置身於言說之外，來觀察與描述其規律（regularities），或是得被迫服膺自己檢視時期的言說，也就是說，是否他必須採行自己要系統化的言說方式？他自己是否是他喜於使用的言說的產物？

薩伊德（Edward W. Said）在其名著《東方學》（*Orientalism* 1978）中，深深依賴傅軻的理論來說明東方在何種程度是歐洲文化菁英的言說所創造出來的概念，以及其在作品中的長久歷史和傳統。薩伊德寫道：「這類作品不僅創造了知識，也創造了它們所描述的事實。」（頁九四）

如同傅軻一樣，薩伊德認為認識論和知識的問題與政治和權力息息相關：「在此情況下，做為歐洲人或美國人絕非靜態不變的事實。而是意識到，雖然只是隱約地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對東方有明確興趣的權力……」（頁一一）薩伊德獻身於由歐洲與北美洲集物資、政治和語言於一爐的權力所創造的東方，卻產生了認識論上的矛盾。這種矛盾一經查覺，就當受嚴厲批判。薩伊德認為傳統東方學學者（*Orientalists*）的「在外性」（*exteriority* 頁一一）使得其言說只是對東方的一種「呈現」（*representation*），而非「自然的」（*natural*）描述。「職是，便有語言上的東方、佛洛伊德的東方、史賓格勒的東方、達爾文的東方、種族偏見者的東方等等。但是從未有過純粹或原原本本（*unconditional*）的東方這回事。」（頁一二、一三）我相信推崇傅軻的言說理論在知識上是無法令人接受的。一方面它意味著要提供普遍的認識架構，另一方面它視純粹

而原本的東方是要由「土生土長」(indigenous)的學者來顯露的「事實」。我們的同僚也是這次會議的籌辦人張漢良教授，去年在里斯本發表的論文中有一段話與我對薩伊德的批評若合符節，他說：「我從不贊同本質論，因為我相信觀察對象的存在並非透明，意義是因觀察者的關係才產生。因為詮釋永遠是種外化行為(exteriorization)，因此就不可能有如薩伊德所想像的，一種『由自身呈現回教世界』的東方學。」(張一九九〇：頁一八五)

由上述我對於質疑西方理論的西方學者以及對薩伊德的評論，各位應可猜出我不相信德希達的解構批評，或傅柯的言說理論，或是薩伊德的呈現理論是亞洲學者的可靠盟友，他們能借助來比較不同的文化系統。如果我們跟從這些評者，能達到的最終目標只是衆多言說的權力競逐遊戲。因為研究者置身於遊戲之中，囿於自身認識上的預設，根本無法看出本身的缺失。但是，這些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不同論述卻阻碍我們，無法趨近現象的歷史本質，以及文學研究者的社會與個人反應。

因此讓我們來看看不同類別的評者(也就是我們的第二類學者)，研究一下他們的主張是否較適合亞洲的文學研究者。令人感到意外的巧合是，我要提及的著作標題看起來都是反理論的，也就是那普(Stephen Knapp)與麥可(Walter Benn Michaels)合寫的〈反理論〉(一九八五)以及歐森(Stein Haugom Olsen)的《文學理論的末路》(一九八七)。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檢視這些評者的論點，我們會發現這些反理論的努力是針對企圖建立客觀妥當的詮釋方法而來。那普和麥可反對赫希(E.D. Hirsch)與悠爾(P. D. Juhl)認為文學作品意義的決定需符合作者語言行動意圖的論調。那普和麥可並不偏向於接受語言與語言行動間之分隔，他們認為語言行動是著重作者意圖的詮釋理論的前提，但同時也是其弱點所在。那普和麥可所提的相反論點是否正確並非本文的重點，重要的是他們拒絕接受詮釋具有理論地位。歐森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反對在理論上強調意義這概念，不論是自主理論(由新批評所發展)、符號理論(由語言學所發展)或是意圖理論(由葛萊斯的語言行動理論所啟發)。依照歐森的看法，意義這概念在理論上的顯赫地位，因為扭曲了關於

基本問題的談論並且阻斷了重要的洞見，已經嚴重傷害了文學的美學（歐森一九八七：頁五九）。

就詮釋在理論上的地位而言，我同意那普、麥以及歐森的看法。但是他們給予詮釋理論在文學研究中的獨霸地位，我卻不敢苟同。如果我們因為無法提出客觀妥當的詮釋方法，就遽下結論，認為必得向理論宣戰或宣告理論的結束，這樣是絕對不正當的。相反地，我們應該發展出一個研究文學的理論架構。在這架構內，文學作品的意義有很明確的地位，是能以經驗試驗的研究領域，因此最後能將洞見導入規律的型態中。

這便引出我對質疑西方理論評者的第三種也是最後一種歸類。我想到的這些批評者主張文學研究應擺脫作品的探討，而集中於研究發生在文學傳播系統裏的種種反應。長久以來，學者都致力於發掘使作品具有「文學性」的形式上或功能上的特點或特質，但是目前在方向上已有明顯的轉變，從強調作品的特質轉而對人類行為規則有興趣。構成文學系統的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作者與讀者的行動。文學性的決定因素不在於文學作品的結構，而是人類能够也願意以「文學方式」閱讀作品的一套行為規則（一種成規）。所謂的經驗論文學研究（empirical study of literature）的代表人物對此立場有系統的闡述。

雖然幾乎全世界各地區已逐漸採行經驗論的文學研究，但是除了德國以及與德語系國家有密切關係的國家（如荷蘭）之外，大家並不知道經驗論文學研究是對詮釋研究的批判性反動。舉例來說，在美國、匈牙利和北歐諸國，經驗論文學研究主要是源於心理系、教學系和社會系。如果經驗論研究偶然被納入文學系，通常是對（李維斯 F.R. Leavis）大傳統的獨霸以及新批評方法的一種直接而有意的反動。

在德國理論中，從檢視作品到檢視文學傳播中人類角色的轉變，可由詮釋學傳統的伊始來說明。尤其是狄爾泰（Wilhelm Dilthey）在一九〇〇年左右提出詮釋學是有別於科學的一種特定類型的理性，更是影響深遠，也肇基了懷疑的態度。以往其理至明的論點，如文學性的本體定義以及根基於重演（re-enactment）與神入（empathy）的詮釋實踐乃引起批評。一九六〇年代二位東歐學者——英卡頓（Roman Ingarden）與穆卡羅夫斯基（Jan Mukarovsky）——在德國的接受情形證明人們已為質疑原有說法做好準備。最後，

姚斯 (Hans Robert Jauss) 和伊瑟 (Wolfgang Iser) 的著作問世，其具前景的主張使得詮釋實踐和內含文意顯得問題重重。但是不久之後，大家清楚地發現，即使是接受美學的創始者仍舊無法擺脫因襲的詮釋態度，亦即仍視理解屬於自己文化傳統並為此傳統標榜的文學作品為詮釋之首要。我們沒有理由反對這種詮釋立場，只要它認定自身是文化實踐，一種賦予意義和價值的行為。但是，它並不適於研究和解釋讀者的反應。

詮釋傳統中的「他性」(otherness) 基本上是與理解這概念相關的。只有在「己方」能收納「他方」時(以姚斯的話說便是「己方在他方中」"Selbstgenuss im Fremdgenuss" 1977: p. 59)，成功的理解才可能。在面對截然不同的文化價值時，詮釋學者仍是束手無策。

相反的，經驗論學者對觀察、描述以及解釋「他性」在理論上有所準備，即便它有極端的差異亦然。讓我提出幾個理由來支持這種論點。

1. 在經驗論的文學研究裏，人文科學並不外於以尋求解釋為特色的一般科學傳統。詮釋學家認為最重要的對象，不再擁有顯赫地位。問題才是學術訓練的對象。

2. 在經驗論的文學研究裏，文學系統的參與者和觀察者是有區別的。和其他的科學研究者一樣，經驗論文學研究者深知主體，亦即從事科學研究、決定資料和組合被視為研究「事實」資料的人，其重要性較對象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這種認知並沒有因此否定角色與角色預期之間可能的分野。科學的研究依靠特別的成規，這些成規長久以來證明能允當而有效地解決關於人與自然之關係以及人與人間調和之種種問題。在這之中有一成規要求在科學過程中的一個特定階段——不是在整個過程中，而是在測試步驟的過程中——研究者要盡其所能避免認同其對象或與其對象混淆不清。

3. 在經驗論的文學研究中，並不視詮釋(文學)作品為科學的解釋活動，而是實用而正規的活動，一種文化參與的形態。詮釋是尋找「這作品(對我、我們、我們這一代)有何意義？」這問題的答案。意義的賦予活動試圖將文學訊息調轉到一個主導的參考座標中，以期在往後的歷史情況中作品能近便可得，如此才能開放或

再開放關於作品的討論，並保持其在本國或世界文典中之地位。基本上我同意柯莫 (Frank kermode 1979) 的信念 (柯莫並非經驗論學者，) 他認為作品的流傳 (survival) 是由一套固定作品與不斷改變的評論間之互動來決定。但是我不同意與我共事的一些經驗論學者的看法，他們對不斷擴增的評論之用處一概否定。我相信詮釋是必要的，但不應從屬於解釋性的有效化 (explanatory validation)。詮釋是有關意義的論述，因此我們無法證明是否有誤。照格雷斯非 (Ernest von Glaserfeld) 的看法，文學作品的詮釋者不能以隨起的 (subsequent, follow-up) 經驗來試驗其詮釋是否正行 (格雷瑟非 1983: 頁 117)。但是依我之見，詮釋者能做的是盡可能使其言說的議論樣式 (argumentational design) 透明而有力，以求得共識。藉著議論性的有效化 (argumentational validation) 的策略，便不至於武斷地判別詮釋。

西方理論堅持科學與人文學科有基本的差異，因而有將文化參與和科學觀察混淆的傾向。因為經驗論學者對此有所批評，因此可視為非西方學者的可靠盟友。讓我就此試加詳述。

經驗論學者深知研究對象絕非「自然的」或「永遠的」。因為過去有一段長時間中，「自然的」和「永遠的」事實上就是歐洲的或西方的意思，因此對研究對象是由歷史文化決定的認識，不失為非西方文學研究的允當出發點。誠然，所謂科學問題也無法擺脫歷史流程之變化。在過去，基因控制或核子分裂在科學領域中並不占有一席之地。帕波 (Popper) 為科學訓練下了一個令人信服的定义：「通常所謂的訓練，只不過是經妥善畫分，由問題和暫時之解決方法構成之結合體。」(帕波 1974: 頁 108) 研究者要問自己與同僚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需要或想要知道什麼？」這個問題在特定文化上有啟發性，而任何想被視為可靠盟友的人該重視此特點。底下，我試著列舉一些非西方學者可能感興趣的問題，但是我有慎重的保留。也許各位對這些問題一點也不感興趣。若是如此，各位應該這麼說。相反地，如果我們同意一些關於研究問題的假設，我能提供的不是研究一種特定文化的方法，而只是嘗試錯誤的普遍性方法。

在理論的層面上，經驗論研究可分為二大研究範域：其一主要與心理學相關，著重於閱讀過程之各種認知

情感方面；其二與社會相關，著重於文學系統之各種制度的方面。

但是在實際從事研究時，很多問題，也許是最有趣的問題，似乎與心理學和社會學二者都有關連。

拿作品文學加工過程 (literary processing) 之成規來說，這些成規是經社會化而來。在西方文化中，小孩先從父母而後從老師那兒得知他們在書中讀到的妖精，是無法在森林中找到的，因為惡鬼實際上並不存在，只不過是虛構罷了。在這例子裏，我們看到了想像與判斷構形 (configurations) 之認知與心理過程，一方面不具真實之參照價值，另一方面有個社會系統——教育——迫使大家接受虛構的情事。我舉的這個單純的例子在史密特 (Siegfried J. Schmidt) 如下所言「美感成規」(aesthetic convention) 中，顯得極重要：

我們社會總認為想將美感溝通之作品 (aestheti communicative texts) 從語言表層作品 (linguistic surface texts) 彙整出來的文化參與者，必須願意並能够淡化事實成規 (fact convention)，將可能的行動拓展至真／假，有用／無用之標準外；然而他們卻趨身於美學上相關之範疇（史密特一九八二：頁八七）。

一般認為美感成規的效用之一是，對文學中展現的事務包容力大於「真實」世界之事務。因此，與「真實」有出入之標準出現在文學時，比出現在說明性作品較能為人接受。

我相信美感成規與事實成規之間關係之本質必須依經驗論方法做各別的探查研究；對此史密特並無異議。真正較美感成規之存在有趣的是這二種成規間之互動與競爭關係。經驗論學者應提供材料做成假設，以解釋造成重視或忽視美感成規主導文學閱讀之各種情況。

我以兩個「案例」來對現在要緊的問題做簡短的說明。第一個例子是衆所周知的，也就是回教世界對魯希迪 (Salman Rushdie) 《撒旦詩篇》(Satanic Verses) 的反應。這裏所引發的是兩個社會系統的衝突。回教社會的特色是「統籌支配力」("undifferentiated patronage" 李夫維爾 Lefevere 1989)，亦即文

學系統乃嵌入於社會環境中，在這社會環境裏，所有的次系統都受一主導的支派力規範，以至於無法發展出自己的行為規則。相反的，西方社會系統的特色為「分化的支派力」(“differentiated patronage” [同])。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系統便發展出自己的行為規則，也有自己的專業機構（如文學刊物、出版商、大學），分享不同形式之支派力。分化的支派力允許不同的詩學理論相互競爭以求認同。因為各種查驗和平衡的結果，屬於分化支派力的社會系統大體上較易於改變，對於改革力量的接受也較統籌支派力下之社會系統來得積極。

比較西方與亞洲文化中文學系統之社會環境，是相當適合以經驗論方法探討的範疇。李夫維爾 (Andre Lefevere) 在最近的文章〈系統的動力〉(“The Dynamics of the System”) 便觸及一些需要進一步說明的特定問題。

在屬於分化支派力的社會系統中，原則上是可能質疑整體同一性此基本假定的。

我有個研究計畫，處理的是一群具有相當知識之專業讀者所形成的文學次級典範。這些讀者是二次大戰猶太人在納粹大屠殺中劫後餘生者的後代。在最近有關此課題之討論中 (Cohen, Gelber, Wardi 1988; Lang 1988)，史密特所致力說明的兩個基本的系統成規——(a)美感成規相對於事實成規，以及(b)多元成規相對於單元成規——似乎受到沉重壓力。在這系統中的主流文類（如小說和戲劇）乃被宣告不足以表現大屠殺的經驗。相反的，邊陲文類，如回憶錄與記錄文學，則受到大力推薦。俄國形式主義所視為文學基本要素的「陌生化」(making strange) 步驟，如果應用到的經驗其本身之事實重於所能想像到的陌生感時，也不受贊同。在這種情形下，歷史事件被賦予的重要性使得支持文學系統之自主與穩定的專家與其他專家之意見相抵觸。這些反對文學系統自主與穩定的專家，想要擺開文學系統與真實價值的關係，而以不正確的歷史詮釋會導致嚴重精神反應的案例來代替。與魯希迪案件相較起來，有關猶太人大屠殺的討論並不是一個極權宗教系統所做的權力指定，而是從內部對文學系統之基本假定所做的質疑。也許，這也因評論的份量而有不同。

經驗論學者可決定是否就自己在有關文學之言說中認為可觀察到之規律來做成假設。其中一種假設可能如

下：讀者面對文學作品時，如果作品的主題結構與其生活世界息息相關，便會以事實成規來接受並判斷這作品，而非參照美感成規；此外，他們也極難忍受與事實相反之情事。即便是熟悉文學傳統的讀者（專業讀者）也是如此。

作品的文學加工過程中真實價值之摒棄或中止，可做為有趣的跨文化研究課題。不僅值得知道抵制接受虛構之情況，也需要對具不同世界模子（World-models）之不同社會中，真實價值這概念的內容，意圖與延展有所澄清。或許，能由精通一個以上成規的行事者，依據不同社會情況與心靈需要來建構美感成規的多重系統。因此，科學研究者任務之一便是為這具種種配置與功能之多重體提供洞見，目的在於形容並解釋人們處理被視為是文學的作品時之態度與反應（蟻布思一九八八）。就這任務而言，研究者絕不應將觀察者與參與者之角色混為一談。研究者對文字的情感與推測，其科學適切性僅有幫助發現的價值。學者不應渴求研究特定文化的方法並擁抱每個批判普遍性而稱允特殊性之主張，而應該彼此交換經驗論上允當有效的成果。一旦捨棄有關文學傳播之可靠解釋，並且將是否維持現狀或尋求改變的決定置於基準規範工作之前，尤其是在教授文學之前，普遍性便為文化相對性所取代。

譯 註

- ① 此段法文意為：「超越意旨的缺隱，使得指涉表意的範域及遊戲永無止境地延展下去。」
- ② 此段法文意為：「這遊戲總是缺隱與現存之間的遊戲，但是如果我們要對這遊戲作徹底的思考，就應將之置於現存與缺隱之前來思考。」

引用書目

- Bleich, David, *The Double Perspective: Language, Literacy, and Soci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Chang, Han-jiang, "Western Theory as 'Colonial Discourse'? Or (One more Time!) the Permanent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s Estudos Literários (entre) Ciência e Hermenêutica*. Actas Do I Congresso Da APLA, Vol. 2, Lisboa, 179-190, 1990.
- Cohen, Asher, Joav Geldet, and Charlotte Wardi, eds. *Comprehending the Holocaust: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Research*. Frankfurt am Main, Bern, New York: Peter Lang 1988.
- Derrida, Jacques,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7.
- Dreyfus, Hubert L. and Paul Rabinow, 1987. *Michel Foucault: Jenseits von Strukturalismus und Hermeneutik*, Aus dem Amerikanischen von Claus Rath und Ulrich Raulff. Frankfurt a.M.: Athenäum 1982.
- Fokkema, Douwe W., "The Canon as an Instrument for Problem Solving." In: János Riesz, Peter Boerner and Bernhard Scholz eds. *Sensus Communis: Contemporary Trend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übingen: Narr. 1986. 245-254.
- Foucault, Michel,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69.
- Glaserfeld, Ernst von, "On the Concept of Interpretation." *Poetics* 12 (1983): 207-218.
- Herrnstein Smith, Barbara "Masters and Servants: Theory in the Literary Academy."

- Gerhard Hoffmann ed. *Making Sense: The Role of the Reader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München: Fink, 1989. 91-106.
- Ibsch, Elrud, "Observer and Participant in Literary Communication." *Poetics Today* 9. 3, pp. 515-527 *Poetics Today* 9.3(1988): 512-527.
- Jauss, Hans Robert *Ästhetische Erfahrung und literarische Hermeneutik*. München: Fink, Bd. 1, 1979.
- Kermode, Frank, *The Genesis of Secrec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Knapp, Stephen and Walter Benn Michaels, 1985. "Against Theory." W.J.T. Mitchell eds. *Against Theory.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New Pragmatism*. Chicago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11-30.
- Lang, Berel ed. *Writing the Holocaust*. London: Holmes and Meier, 1988.
- Lefevere, Andre, "The Dynamics of the System: Convention and Innovation in Literary History." Theo D'haen, Rainer Gröbel and Helmut Lethen eds. *Convention and Innovation in Literatur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37-55.
- Olsen, Stein Haugom *The End of Literary Theory*. Cambridge 37-5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opper, Karl, R., 1974. "Die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Th.W. Adorno a.o.,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Darmstadt und Neuwied: Luchterhand.